

共产国际 与 中国革命 关系史

下

黄修荣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

下 册

黄 修 荣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世平

封面设计：孙琳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

下 册

黄修荣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1.75印张 305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ISBN 7-5035-0109-X/D·55

上、下册 定价：9.00元

目 录

第四章 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1)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1)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八七会议	(1)
二、罗明纳兹的“不断革命”论与瞿秋白“左”倾盲 动错误	(13)
三、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	(19)
四、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与瞿秋白“左”倾盲动 错误的结束	(25)
五、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	(35)
第二节 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与李立三“左”倾 冒险主义	(46)
一、共产国际六大与“第三时期”理论的形成	(46)
二、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生	(60)
三、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纠 正	(73)
第三节 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94)
一、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扶持	(94)
二、六届四中全会与王明的上台	(102)
三、共产国际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	(109)
第四节 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	(121)
一、共产国际与中国农村的苏维埃运动	(121)
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130)
三、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39)
四、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一次 转折	(145)

第五章 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53)
第一节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政策的初步转变	(153)
一、30年代初期的国际国内形势	(153)
二、共产国际与王明的“保卫苏联”、“下层统一战线”方针	(163)
三、共产国际政策的初步转变	(174)
四、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酝酿	(181)
第二节 共产国际的战略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方针的确定	(188)
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	(188)
二、共产国际的影响与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方针的确定	(203)
三、国共两党的初步接触	(214)
第三节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223)
一、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	(223)
二、西安事变的爆发与中共的方针	(239)
三、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246)
四、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255)
第六章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战争	(267)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对华政策	(267)
一、七七事变后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267)
二、共产国际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	(277)
三、苏德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287)
四、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	(295)
第二节 共产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302)
一、共产国际的解散	(302)
二、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	(311)
附录一：	
部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联赴华顾问名单	(319)

附录二：

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论著、资料、译

文目录索引(339) |

第 四 章

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八七会议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建立了反共反人民的新军阀统治。国民党新军阀完全继承了北洋军阀的衣钵，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加紧剥削广大工农群众，残酷镇压革命人民。其次，工农运动暂时处于低潮。这时工人的罢工斗争虽然连续不断，但多数是自发的、分散的经济斗争；各地农村虽然也不断爆发抗租抗税斗争，但这些斗争分散而不集中。第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成了大资产阶级的追随者；革命营垒中原有的4个阶级，这时只剩下了3个，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反革命的力量暂时超过了革命的力量，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第四，在蒋介石反革命屠刀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陈延年、赵世炎、恽代英、罗亦农、向警予、彭湃等先后慷慨就义。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只剩下1万人左右，它直接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也只有7万人左右。

但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为了帮助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华接替罗易和鲍罗廷的工作。7月23日，罗明纳兹到达武汉，协助他工作的德共党员纽曼也同时到达。

罗明纳兹到达汉口后，很快就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见面，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全权代表。他认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错误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说，出现这些错误的根源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盘踞，他们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他表示，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任领导工作，并且要占多数。由于共产国际授与罗明纳兹全权，以纠正中共中央过去的错误、制定新的政策和指导中共中央工作，所以他在土地革命初期具有很大的权威。他来华后力主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以便审查旧的政策，确立新的方针，清算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成员。

7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在武汉开会。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加伦、范克等人出席了会议。在讨论南昌暴动问题时，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下述指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可把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撤往农村，俄国顾问不参加暴动。^①加伦在会上表示，如果张发奎同意回师广东、不强迫共产党人退出其部队，则不必举行暴动。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会议还决定派张国焘去传

^① 转引自乌传友、马宝华合编：《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大事提要》，1985年安徽出版，第171页。

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同罗明纳兹一道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的新时期。

为了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督促和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党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青年团代表及两湖代表、军委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及协助他工作的纽曼、洛蜀莫娃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有4项：（一）听取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二）讨论并通过罗明纳兹起草的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三）听取瞿秋白作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四）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

罗明纳兹首先在会上作报告。他在说明了召开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围绕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内容着重阐述了以下5个问题：

第一，严厉地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错误。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纠正，中国共产党将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了。他说：“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他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最大错误，就是“未将国际的指导达到群众中去”。^①他指责说：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

^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4页。

会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决议案，尚未译出，许多中央委员都不知道。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也还没有传达到群众中去讨论。中央委员即使知道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也不过只是口头上承认，甚至于根本不接受。

罗明纳兹认为，从1927年4月开始一直到7月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都是按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去决定自己的策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让步，甚至失掉了我们党自己的独立性”。党的领导机关对工农运动的政策，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改良的”、“变节的”。他说，党压制了农民运动，“结果使农民运动遭了大的摧残，农民群众遭了大的屠杀”；党要工人让步，“结果使工人运动大大失败”。^①

罗明纳兹指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执行了机会主义方针的严重错误。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地制定出今后的革命任务，也就不能领导新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方针，就必须指明它是怎样错的，使每个党员都接受过去的教训。

在为八七会议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中，罗明纳兹指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之所以执行机会主义政策，并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如此之深，“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不好”，即党内生活状况不正常，缺乏民主制度。这表现在：“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他写道：由于“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得以放开手去实行自己的机会主义”，“中央的领袖独秀同志有许多问题虽经决议后，他仍要以个人的意思来改变此决议”。罗明

^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纳兹指出，“以后我们党的指导要集体化，不要族长化。党的问题要使群众知道”。他警告说：“现在一定有人以为他自己是在党之上的，或者他要非难我们今天选出的临时政治局。我们对此应用党的纪律去与之实行坚决的斗争”。^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尤其是揭露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无原则的退让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种种表现，这无疑是正确的。他在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的建议，也是对的。但是，他批评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如前面所述，陈独秀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了主观因素外，同他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示也是分不开的。

第二，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正确地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较少，经验不多，但其他任何阶级都不如它有力量。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如果没有国际资本的帮助，它早就倒台了。至于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数虽多，但事实已证明它们是不能领导革命的。

在分析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时，罗明纳兹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去的一定阶段中是革命的，但现在已经反动了，它害怕工人阶级比害怕帝国主义厉害得多，它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来压迫无产阶级。基于这种认识，罗明纳兹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而应该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以达到反对资产阶级的目的。他说：“我们不应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而应该懂得，“只有资产阶级打倒后帝国主义才能打倒”。他把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5页。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错误地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很坚决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①

罗明纳兹的这些意见，并不是他自己的独创，而是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和政策提出来的。

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认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同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上说：“当中国革命还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不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来，当中国革命已成为土地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离开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就用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代替了那一个政策。”^②7月底8月初，斯大林又接连发表文章和讲话，认为在广州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到了武汉时期，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都转到了反革命阵营；汪精卫叛变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只剩下了农民和城市贫民。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认为自从蒋介石叛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民族革命战线，跑到了反革命阵营。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混同起来，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统统作为危险的敌人和打击对象，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此作为分析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制定策略方针的主要依据。这就从阶级关系上混淆了革命的阶段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成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屡犯“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2、53页。

②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讲话》，《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第三，提出了有关土地革命问题，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基本方针。

罗明纳兹在会上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明确指出，“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国革命到另一新的阶段”。他在报告中还指出，“中国农民仍不能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他不跟无产阶级走即跟资产阶级走”，“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农民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①他批评了陈独秀等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认为在大革命后期，如果能坚持党的独立性、正确领导农民运动的话，就不会遭受如此之大的失败。在他的帮助下，这次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把这些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这个议决案还规定，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②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是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革命提出的一项基本任务。八七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一次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与此同时，会议在罗明纳兹的帮助下把土地革命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确定了党的武装暴动的总政策。共产国际的帮助，虽然对会议确定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罗明纳兹在会上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精神，提出了中国土地革命必须实行土地国有的主张，再次强调指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而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③很明显，这种土地国有的主张在当时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对土地革命造成了不良影响。

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②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③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4页。

第四，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提出了要做“左派国民党”运动的主张。

罗明纳兹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在联合战线中应该“有独立存在及坚决的批评的自由，……列宁说：如果在联合战线中不能独立的存在，不能有批评的自由，则等于出卖阶级的利益”。^①他批评说，中共中央的主张恰与此相反，仅仅同国民党几个上层领袖联合，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的政策及批评国民党的权限取消了，并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甚而至于工农运动也要让国民党来做”，“这是非常错误的”。^②

他在报告中重申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的同时仍应留在国民党内的主张，认为“现在不应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要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③他说，为什么不退出国民党呢？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有三点作用：（一）可以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主义及其“变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意图。（二）虽然国民党的上层叛变了，但可以在国民党的基层加紧做工作，组织左派队伍。（三）有利于批评和稳定中间派。根据罗明纳兹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一指示精神，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阐述了中国国民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下的理由是因为，（一）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二）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三）便于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因此，这个表达了共产国际意见的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国民党）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凡是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

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②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发言》，《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③ 同上书，第54页。

下举行暴动而胜利的地方，工农群众团体应当用团体加入的方法，加入这种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群众团体联合的党，使反动分子不能假借国民党党部名义，来实际上做阻滞革命的工作”。^①

罗明纳兹在为八七会议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中虽然也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但又提出，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群众，与他们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们的下层的组织联合”。^②

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接连叛变，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还死抱着国民党的旗帜不肯放手，实在十分荒唐可笑。

第五，提出了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罗明纳兹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一样，不顾历史事实，反复强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策略是始终“正确的”。它们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根本否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种种错误。

面对着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罗明纳兹也不得不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国际有时自然也是有错误的”，^③但是他接着连忙把话题一转：“国际有许多的经验，我们应当相信，接受他的指导，不然我们将会走到非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④

对于罗明纳兹坚持为共产国际的错误开脱责任的做法，罗亦农、蔡和森等人十分不满。罗亦农在八七会议上当着罗明纳兹的面说：“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的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既认

①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133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③ 同上书，第54页。

④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魏金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魏金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才加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动时他要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也知道是国际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国际要负责的。”^①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罗亦农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所犯的路线和政策上的错误，但严肃地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并追究了共产国际用人不当的错误。这种直爽的批评，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罗明纳兹对于这些批评并没有正确对待，而是以种种借口搪塞过去。他一方面说：“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有错误的”，另一方面又说：不管罗易、维经斯基等的“路线如何，总比我们中央有错不改要好些。不管国际代表有无错误，主要的还是中共中央机关之健全。只要我们是革命的机关，纵使国际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②

在罗明纳兹作完报告之后，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关于党的新任务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策略方针。

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召开的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里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从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决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这就给全党指出了

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3、64 页。

②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结论》，《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7 页。

正确的革命斗争方向。这次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勇敢的战斗精神，重新组织了受到严重破坏的革命队伍，扭转了在党员和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从而拯救了党，拯救了革命。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从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转变到同它们公开决裂；从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转变为坚决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忽视武装斗争，转变为发动工农群众，确定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用暴动政策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从忽视农民土地问题，转变到把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中心问题。

总的来说，八七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它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重新复兴和发展。“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底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它“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底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底目标，定出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样，八七会议便将中国共产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①

但是，八七会议也存在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表现在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纳兹“左”倾错误观点与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②

八七会议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① 《政治决议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175页。

② 毛泽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9、960页。

